

“死海古卷”的故事(三)

四、研究“死海古卷”的意义

“死海古卷”的发现之所以引起轰动,并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库姆兰学”,吸引了许多学者来对其进行研究,并不是仅仅因为它们是两千年前的古物,可供玩赏和发思古之幽情,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

“死海古卷”有什么学术价值呢?到目前为止,至少有这么几点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1.现在世界各国流传的《旧约圣经》的最古老的全集抄本的时间是公元1010年,最古老的单卷抄本也是公元9世纪才最后确定的“马所拉文本”。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最重要的经典的《旧约圣经》,在长期的口传和传抄中难免会发生一些错漏和谬误。“死海古卷”中有《旧约圣经》各卷的抄本,其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之间,比原来古抄本的年代提前了800-1000年。“死海古卷”中的《圣经》抄本未经后世修改、增删,保留了最古老的原来样式,因此可以作为更权威、更准确的文本来对现行的《旧约圣经》进行校订。

例如,原来的《圣经·以赛亚书》中有这样的文句:“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49:12)过去人们都认为,“秦国”指的就是中国,而《以赛亚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因此那时古犹太人就与中国有来往了。但“死海古卷”中发现的《以赛亚书》的这段文字却与今本不同。所谓的“秦国”(Sinim)应该读作“色耶尼”(Syene),指的是今天埃及的阿斯旺地区。犹太王国灭亡时,有一批犹太人流亡并定居在阿斯旺的象岛,还在那里建立了犹太会堂。这一问题出在后人传抄的错误。新的《旧约·以赛亚书》英文

译本已根据“死海古卷”中该卷的抄本作了数十处修正。如上面所说的“色耶尼”,现在国外的新版《圣经》或已改正或加以说明该地是阿斯旺。

学者们初步研究的结果表明,“死海古卷”中的有些抄本与今本基本相同,而另一些抄本却与今本差异较大。由此可见,今本并非是完全忠实于原型的本子。研究还表明,犹太人用的《希伯来圣经》与古卷中的抄本最接近,而基督教的《旧约》与古抄本差异较多。人们希望,将来能在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一种新的校勘本。要知道,如果没有权威的古文本为依据,任何人都不敢,也不可能随便对极其重要的《圣经》做任何改动。

2.“死海古卷”中包括了《希伯来圣经》、《次经》、《伪经》等宗教文献,还有大量对《圣经》的注释、讲解以及古犹太社团的日常文书等,它们有力地证明了这些经典以及其它古代文献之间的关系。从犹太教教义来看,既然“死海古卷”中《正经》、《次经》、《伪经》三经并存,说明早期的犹太教并没有像后世这样来区分这些经典的等级和层次;也说明将《希伯来圣经》(即《旧约》)看作《正经》这一说法形成的年代较晚。因而要研究早期犹太教思想,也就应当三经并重。而在基督教会中,在马所拉《圣经》文本确定下来之后,其它早期的文本就不再是合法的宗教经典了。

3.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死海古卷”中除了常见的方形犹太字体希伯来文外,尚有古体的希伯来文。犹太字体乃直接由阿拉米语字体演化而成,而古希伯来字体则是从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成,但后来却不使用了。此外,古卷中还发现了阿拉米语的《约伯记》,阿拉米语是古代

宗教历史

西亚流行的一种国际语言,这一译本可为阿拉米语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总之,古卷中的不同文字的抄本,对于研究这些古代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是很有价值的。

4. 过去人们对犹太教艾赛尼派知之甚少。迄今为止,只有古代犹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在他的著作中写到一点有关艾赛尼派的情况,人们只知道该派是当时犹太人中的四大派别之一。“死海古卷”中有大量关于艾赛尼派情况的材料,有他们的社团法规,有他们的感恩诗篇,还有他们描写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战争的作品。这些材料能极大地加深人们对艾赛尼派宗教思想和社团生活的了解。

5. “死海古卷”对研究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尤其受关注。古卷产生的时代正好是犹太教处于动荡分化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艾赛尼派,而早期的基督教则直接产生于犹太教法利赛派。然而,“死海古卷”的许多材料表明,基督教受艾赛尼派的影响也很明显,尤其是世界末日论和弥赛亚(救世主)的思想;《新约圣经》与古卷中的一些文本有不少联系;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耶稣和洗施约翰都是艾赛尼派的成员。总之,这些都说明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在教义、经典、仪式、组织形式等方面的联系和相似之处。

另外,对于研究古代西亚地区的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艺术、民族关系等许多方面,“死海古卷”也都是极其珍贵的材料。

五、“死海古卷”的归宿

所有发掘出来的这些《死海古卷》现在在何处呢?

我们前面谈到,最早的一批,也就是阿拉伯牧童穆罕默德·伊尔迪伯偶然发现的那一批经卷,一开始就被耶路撒冷的叙利亚正教的大主教阿塔那修·塞缪尔以教会的名义买走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做学问搞研究的人,他买下

这些古物后,本想利用它们来发一笔财。于是,不久后他就开始寻找买主,但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愿意购买的人。当时以色列政府倒是有意出钱买下这批宝贵的古物,然而由于以色列刚与阿拉伯国家打完仗,双方彼此敌视,互不往来。耶路撒冷城当时在约旦的控制之下,这些东西不可能卖给以色列。

1954年,塞缪尔来到美国,希望能在美国找一个买主。他在《华尔街杂志》上登了一条关于出售这批经卷的广告。碰巧的是,一位重要的以色列人当时也在美国,此人就是前面提到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考古教授苏格尼克的儿子伊格尔·亚丁。亚丁不仅是以色列国防军一名著名的将军,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考古学家。看到这则广告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获得这批宝贝的难得的机会,但他也知道塞缪尔主教是不敢违反约旦政府的规定把东西直接卖给以色列人的。于是他立即采取行动,通过中间人与塞缪尔进行联系洽谈,同时又通过纽约美国犹太人的戈特斯曼基金会筹集到了25万美元,最后成功地一举将这批无价之宝购买了下来,送回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伊格尔·亚丁把这次成功购买“死海古卷”的活动称为“羊皮卷行动”,就如同他指挥打的一场成功的战役一样。

另一批较完整的《古卷》由法国考古队和约旦文物部经过1952-1956年发掘出来后,便存在东耶路撒冷洛克菲勒博物馆,因当时东耶路撒冷是在约旦的控制之下,而发掘工作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然而,1967年6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大获全胜,一举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所以这批经卷也就全部落入了以色列人的手中。

就这样,大部分《死海古卷》都到了以色列,只有少量的残卷流散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里。

1969年,以色列政府拨巨资在以色列国家博物馆里专门建盖了一个“死海古卷馆”。这个馆的造型独特:整个馆室在地下,地面上只

有一个白色的穹顶圆型建筑,旁边有一堵黑色玄武岩墙壁,一白一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喻意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在地下的圆型展室里,人们可以看到置于玻璃展柜中的古卷原件。

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专家们从“死海古卷”中发掘出许多珍贵的材料,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然而,还有许多经卷有待于进一步整理、编辑、翻译和研究。不仅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争议,出版界也为争夺出版权而诉诸过法律,最后达成了一项妥协,决定出版一套全部经卷内容的影印本,供研究者使用。人们相信,通过深入研究,今后还将会从这些2000年前的书卷中发现更多的东西,使迷离朦胧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六、“死海古卷”与“敦煌古经”

在库姆兰遗址发现“死海古卷”的经过,与在中国敦煌的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经过颇有相似之处。

1900年6月,住在敦煌千佛洞道观三清宫一名姓王的道士看到山崖因受雷电震动而出现裂缝,使用锄头顺着裂口深刨,挖开后便看到一个洞口,打开洞口后里面的景象使他大吃一惊,在长宽各为2.7米,高2.5米的洞穴里存放着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的纸写经卷,数量多达万余种!当时孱弱的中国正在遭受八国联军入侵,顾不上来管理、研究这些宝贵的经书。王道士便从洞中取出少量经卷,作为古董和书画卖出换钱。

一些外国人闻讯后却纷纷前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都以极低的价钱从“藏经洞”弄走大量珍品;俄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也先后来这里寻“宝”。1910年,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奔走呼吁下,清政府才醒悟过来,急忙下令把“劫后余生”的八千多件经书运到北京,收藏在京师图书馆。但许多精品经书已流失海外。

据考证,敦煌藏经洞里的卷子,大部分为唐代的手抄佛经,也有一些世俗文书和书画作品,多数是汉文文献,也有不少藏文、梵文、回

鹘文,甚至波斯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如今,与研究“死海古卷”的“库姆兰学”一样,研究敦煌文献和文物的“敦煌学”也已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不仅敦煌古经与死海古卷的发现过程颇为相似,而且这两个文化宝库的埋藏内容、埋藏方式也非常相似:二者都是以大量的宗教经典抄本为主,另有一些其它文字材料和实物;二者都是埋藏在沙漠的洞穴里,在许多世纪里默默无闻,文献史料上也没有什么记载,只是一个偶然的时机才使它们重见天日。另外,学者们对为何库姆兰山洞和敦煌藏经洞会藏有这么多的文献经典的所进行的推测也十分相似,有的认为它们是古代的图书馆,有的认为它们是当时的写经所,还有的认为二者都是为了避免遭到战火毁坏,而专门找来存放经卷的地方。

当然,两者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从内容来看,敦煌藏经洞中藏的主要是佛教经典,而库姆兰山洞中的主要是犹太教经典;从保存的方式来看,敦煌佛经都是写在纸上,用布包裹后堆放在洞中,而库姆兰经卷是写在羊皮上,卷好放在陶瓮中;从文献数量来看,库姆兰山洞中只藏有600余种经卷以及许多碎片,而敦煌藏经洞中仅经卷就多达18000件,另外还有字画、丝绸等诸多文物;最大的不同大概是两者间年代的差异,敦煌佛经的埋藏时间大约在公元1000年前后(唐宋之交),而死海古卷的埋藏时间则是在公元1世纪后期,比敦煌佛经大约早了900年左右。

但不管怎么说,死海古卷和敦煌古经书的发现,都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引起轰动的事件。它们都大大加深了人类对自己的过去的认识,也再一次证明了古代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对世界文明所作的卓越贡献。另外,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先人虽然相距万里,彼此隔绝,但却不约而同地以“窟藏”的方式将一大批文明的精华留给了后代,大概也可以说是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全文完)